

· 新时代中国史学 ·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 与新中国史学科发展

宋月红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赓续古老中华文明，又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中华文明延续和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蕴含独特的历史观。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认识和把握新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坚持历史发展与认识逻辑的统一。在加强新中国史学科建设上，特别需要围绕新中国国家学说、历史理论，着力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线与内涵，推动新中国通史及国别现代化比较研究，深化和拓展新中国史研究，构建新中国史自主知识体系。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历史逻辑 新中国史学科

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底蕴、内在机理和时代要求观照新中国史，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新中国史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与中国古代史、近代史不同的是，这一历史是党领导人民正在不断创造的历史，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因此，作为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建设、发展的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和基本内涵的学科，新中国史研究既具有史学意义上的一般性，又具有与其研究对象相适应的学科理论和方法上的特殊性。新时代新征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

守正创新中不断开辟新境界，中国式现代化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不断推进、行稳致远，这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同时也意味着新中国史这一学科要紧跟时代步伐，特别是要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深化研究内容，拓展认识视野，创新研究方法和手段，以更好地把握新中国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

一、中国式现代化从中国社会矛盾运动中 开辟、深化和拓展

人类社会在矛盾运动中发展。在人类思想史上，《共产党宣言》描述了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揭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这为人们认识自然、认识人类社会提供了科学思想武器，具有革命性、开创性、突破性意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社会基本矛盾，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彼此共同作用构成社会的矛盾运动并支配社会发展进程。在认识论意义上，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性的要素，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是分析社会发展的可靠依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根本动力和内在机理中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与发展方向。

《共产党宣言》科学阐明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①为救亡图存，中国人民不断抗争，仁人志士奔走呐喊。马克思、恩格斯深切关注世界的东方，科学预见“中国社会主义”，指出“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并为他们心中的新中国取名为“中华共和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页。

国”。^①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自觉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任务，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由此，“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②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③ 为实现民族复兴，党领导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创建新中国，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④ 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在此基础上提出和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至 1956 年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华民族实现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党的八大科学判断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⑤ 在此背景下，党领导人民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努力把我国逐步建成一个拥有现代农业、先进工业、强大国防及尖端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科学分析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并以此为契机实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⑥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 《时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0 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77、278 页。

②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 3 页。

③ 毛泽东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31 页。

④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4 页。

⑤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9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41 页。

⑥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 5 页。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与此同时，中华大地也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族复兴的制度保证更为完善、物质基础更为坚实、精神力量更为主动。

由上可知，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总是在相应地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中推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中国史就是一部适应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变化而推进的社会发展史。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蕴涵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

在党史、新中国史上，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探索、推进、深化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认识上，“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②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布局，不难发现二者相辅相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战略布局的坚实理论支撑，深刻阐明了这一战略布局的科学性和必然性。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是立足于中国国情与现实的重大理论创见，昭示了我国现代化发展的未来走向。

在思想史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党的思想理论发展的鲜明主题主线。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时，习近平总书记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将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为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时集中概括这一历史发展成就，就是“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此基础上，党从“精神之源”凝练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11 页。

② 习近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求是》2025 年第 1 期。

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并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是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①

马克思主义是主要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其认识论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植根人民，始终站在时代前沿，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不断探索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为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极大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②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深刻改变了中国”，关键就在于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并用以探索解决中国问题。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为驳斥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强调“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离。在他看来，“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就应该设法让它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而要做到这点就要让“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因此，“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要“研究实际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宣传理想的主义”，二者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在这篇文章中，他进一步阐述了对待社会主义的基本态度和原则、立场，认为当“主义”被“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时，它会“因时、因所、因事”而变，以适应环境；而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更要致力于“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2、3、8、11、13页。

②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9、11页。

环绕着他的实境”，进而让“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①之后，李大钊又相继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由》等文章，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回答中国社会根本性问题，初步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思想基础和学理依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传承和发展历史中国的历程中，在成立新中国、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和必由之路，是党的科学理论体系创建、形成、发展和创新的历史进程与理论成果。从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到《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逐步把中国革命理论、道路推向成熟。1938年，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②党创立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这一科学思想的活的灵魂和贯穿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新中国成立后，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提出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这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

① 李大钊 《再论问题与主义》，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 《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9、50、51页。

②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

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魂脉、旗帜、精神源泉。

从实践论意义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指导下，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深刻变革，置身这一历史巨变之中的中国人更有资格、更有能力揭示这其中所蕴含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要有这样的理论自觉，更要有这样的理论自信。”“把科学思想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以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②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与此同时，党把“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定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而且在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历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③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党史与新中国史的历史演进逻辑、理论建构逻辑和实践展开逻辑来看，党史研究的重心在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中国史研究则聚焦于中国式现代化。这正是推动党史与新中国史研究融合发展的认识论要求和方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6 页。

② 习近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66、68 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6、21、22 页。

法论依据。在学科研究上，根据中国共产党诞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矛盾运动，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主题主线，将“两个结合”贯穿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之中，深化和拓展党的思想理论发展史、治国理政史研究，引领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历史命题、时代主题。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不仅是党史党建学研究、新中国史研究必然的重要对象、内容，而且是研究的根本前提与基础，是正确党史观、国史观和大历史观的理论基石、核心内涵与要义。

新中国史研究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为新中国史理论的总主题，旨在将其置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深入探究中国共产党如何运用其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和精神力量，领导人民接续创造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伟大成就。这项研究主要从社会矛盾运动、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等维度展开。

一是深刻揭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党面对的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主要任务和历史进程中，具体、历史地阐明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和人民的选择，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二是全面阐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是如何“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①这一时期的革命和建设无可辩驳地昭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三是立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科学揭示党是如何处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9页。

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辩证统一关系，接续探索和拓展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一时期，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障与雄厚的物质基础，充分显示了改革开放对于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决定性影响与关键性作用，从而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引领国家走向繁荣昌盛的根本大道。

四是深刻阐述和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这是新时代新征程历史发展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历史观、价值观的生动写照，充分彰显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所反映的精神面貌和拥有的力量源泉。

三、构建以新中国史为主干、中国式现代化为主线的新中国史学科体系

从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联系到或过渡到研究新中国史学科发展这一认识主题，合乎历史发展实际的认识逻辑。在新中国史上，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长期探索和实践的重大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中国式现代化，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相结合中，不仅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更在国际社会上提供了一种迥异于西方的现代化新范式。这是中国人民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的中国方案，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新中国史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集中体现，中国式现代化为加快构建新中国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与特点。这既是新中国史学科建设的理论依据，又是其研究的重要内涵和价值意义。

新中国史学科兴起和发展以来，主要以党史党建、历史学等作为学科基础，为国家写史、为人民立传，并逐渐从党史研究中独立出来，形成本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新中国史学科体系主要包括史料学、史学理论与方法、通

史、专门史、专题史（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外交史等）。任何事物的历史，纵向是“历史”，横向则是“社会”，研究历史既需要研究其历史底蕴，又需要揭示其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机理和时代内涵，反映其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

根据调研和观察近年来新中国史学科的运行与建设状况，新中国史学科发展存在以下亟待处理和解决的实际问题。

一是新中国史研究忽视甚或缺乏关于历史发展“内在机理”的深入系统研究。目前的“学科布局”特别是研究领域，如关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研究，“五位”的整体内容相对分离，缺乏“一体”的逻辑体系；历史发展的“内在机理”研究不够深入和立体化；即使专门史研究，也有越来越“窄化”、缺乏广度和高度，触及不到“历史深处”等问题。

二是新中国史学科意识不强，学科理论不成熟，学科特点不突出，学科地位在国民教育体系中不够明确，大多局限于和停留在专题史、专门史研究上，不利于把“新中国史”放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社会发展史中去立体、全面地观照。

三是新中国史研究尚未形成贯通融合的学术体制机制，做不到研究领域全覆盖，甚至本领域的重大历史、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也不够突出，导致研究的综合性、融合性、延展性、开放性不充分，学理性、理论性研究较弱。

四是从研究成果看，新中国史在学理性研究上，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交融不多，研究路径单一，理论与方法研究有些“简单化”甚至“固化”；在学科研究的内涵、角度、优势与特点上，与党史研究的区别也不够明显，研究多有“重复”，而且新中国史研究的一些内容和领域如行政建制沿革、“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①历史地理、区域协调发展、国际比较等，也不够突出。以此学科基础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存在诸多不适应性。

事实上，根据中国式现代化在新中国史上的历史地位与意义，应从中国式现代化角度深化对新中国史学科的认识，从打基础、利长远出发，不断探

^① 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习近平书信选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211页。

索新中国史学科建设的规律与特点。在加强新中国史学科建设上，可以先围绕一些重要问题展开研究，具体如下。

第一，关于新中国国家理论研究。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将新中国史研究推向“新中国学”。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历史命题，重点研究什么是新中国，新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新中国是怎样建设和发展的，由此构建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为基本内涵的新中国历史理论、新中国学理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学”。该学科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主线，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科学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

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创立唯物史观，科学揭示国家的起源、概念、本质、职能和发展规律，指导马克思主义政党以正确的国家学说和国家观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推进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持续推进其中国化时代化，完成新旧中国社会变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党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应用于新中国建设和发展，探索回答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有机统一。新中国的历史发展深刻蕴涵着正确世界观、历史观和文明观，是探索新中国建设和发展规律、丰富和发展新中国史理论的根本思想认识基础。

新中国史理论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关于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道路、制度、成就、经验和前途命运的思想认识体系，是概括和总结这一历史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内在机理和历史大势的规律性认识。它是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的理论形态，而一般意义上的学科性质的史学理论，则是新中国史理论在认识、方法和手段意义上的一种反映和表达。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是新中国史理论的基础与源泉，从历史深处透视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而新中国史理

论与作为学科性质的史学理论，是构建新中国史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认识基础和学科发展基础。

第二，关于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线的新中国通史研究。新中国通史研究既要依据新中国史自身的分期，又需贯通新中国史的整体与全貌。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主要围绕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新中国建设和发展，并追溯科学社会主义创立和建党以来的历史发展过程。研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主要围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前的新中国建设和发展，聚焦改革开放史、改革开放精神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突出改革开放史在“四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在新中国史中的转折意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则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精神，围绕党的十八以来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史，结合党史党建学研究，推动新中国史研究与党史党建学相辅相成，发挥各自学科优势与特点。对于新中国地方史志研究，应主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央地关系史，充分运用史志进行系统研究，增强对新中国行政建制沿革、历史地理、区域发展等内容研究，拓展和深化新中国史研究，在新中国史研究中建构和推动行政学、社会史、文化史、史志学、历史地理学、历史编纂学等学科分支或领域发展。这一新中国史学科布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理论基础和学科基础，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脉络，围绕党的治国理政史、党领导人民进行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史，牢牢把握新中国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指导和推动新中国史研究编纂、宣传教育，贯彻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的辩证统一，遵循历史发展的“合力”及“螺旋式”上升的基本内涵与特点，放眼国际视野，做到中外结合、地方史志结合，纵横交错、立体全面。这样的学科布局，重在提升新中国史研究的理论性、学理性、通史性、世界性，推动构建新中国史自主知识体系。

第三，关于国别现代化比较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①这是进行国别现代化比较研究的学理基础和认识依据。一方面，研究新中国

^① 《习近平向“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蓝厅论坛致贺信》，《人民日报》2023 年 4 月 22 日。

的中外关系，面向“两个大局”，立足中国，胸怀天下，集中国绕新中国外交史、国际关系史、区域国别史进行研究，把新中国史放在世界史中进行观照和比较研究。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着“美西方对新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不实与负面言论”的各种干扰和破坏。长期以来，美西方以强权政治逻辑、文化霸权主义及“西方中心主义”等各种论调，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大做文章，质疑、歪曲、否定我们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与文化，进而从历史观、价值观、文明观等方面干扰和破坏我们坚持唯物史观、树立正确党史观、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美西方对新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不实与负面言论”，其背后一般有一套自我认识逻辑，并由此设计、衍生一系列关于某一问题或某类事情的立场、观点、方法、路径和手段等，兜售和宣扬美西方的意识形态，图谋冲击、消解我们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混淆国际视听，误导人们的是非判断，扰乱我们的思想理论建设、价值导向和民心根基。反对、批驳和抵制这些错误言论，既要针锋相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又要旗帜鲜明，坚持“以我为主”的立场，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上进行学理化和系统化的批驳，加快构建新中国史自主知识体系。

针对美西方歪曲和否定中国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我们通过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政治发展史、比较与分析西方政党制度，论证新中国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针对美西方污蔑中国“只搞经济改革，没搞政治改革”，我们要讲清楚中国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在于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既非改弦易辙，也非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大力驳斥将改革开放曲解为向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方向改的错误观点。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而要指出在某些方面、某个时期，快一点、慢一点是有的，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不能改。针对近年来国内外有人故意提出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等错误观点，我们必须作出鲜明回答，不仅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

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① 还要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强调失去这些就不是社会主义。要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相结合的角度，充分论证历史的必然结论和人民的必然选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真谛和规律。

总之，只有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以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具体历史实际为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从正反两方面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思想理论引导、精神力量支撑和学理支持。这一切的实现，归根结底取决于党的坚强领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②

（作者宋月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邮编：100009）

（责任编辑：敖 凯）

（责任校对：尹媛萍）

①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求是》2019年第7期。

② 习近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求是》2025年第1期。

SUMMARY OF ARTICLES

On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New China History // Song Yuehong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refers to th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ot only has it continued the legacy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but also promoted its developmen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rticularly dur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eriod. It represents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the practical logic of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progress of human society. This journey is an embodiment of a profound and distinc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y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grasping the laws govern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New China, we must uphold the unity of historical progress and cognitive logic. In strengthen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of New China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it is imperative to focus on the state developed theories and historical theories of New China, with the special emphasis on advancing general histories of New China and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ies on modernization through the framework and substanc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is will deepen and expand the theoretical depth, comprehensive scope, and global perspective of New China historical research, thereby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within the discipline of New China history.

A Study on the Formation Path of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 Li Chang, Wang Zimeng

The study of the formation path of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exhibited clear developed stage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o the mid-1980s, the field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transplant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foreign theories in China through practice. Between the